

經典之後，期待新星：2003年台灣文學綜論

◎ 陳建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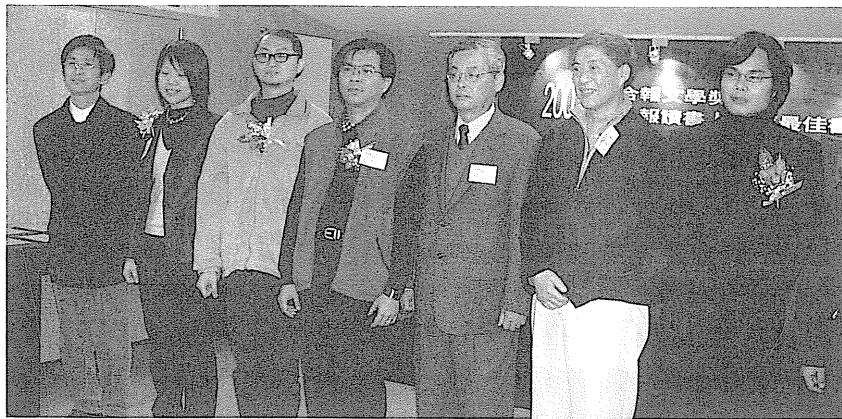


圖 26 2003聯合報文學獎頒獎典禮。左起陳義芝、周丹穎、冼文光、嚴忠政、楊牧、白先勇、陳錦昌。（陳姿羽 提供）

非典型肺炎的肆虐，大概是2003年台灣以及東亞國家最受矚目的事件。死亡使者般的疫疾肆虐，不僅帶來人命的傷亡，更為重要的影響是，人與人之間刻意地或無意地流露出來的猜忌與疏離，使我們在那段期間徹底地孤立起來，親情、友情乃至愛情都殘酷地被試煉著，那恐怕是比疫疾更令人難以承受的創傷罷。當然，我們應該也不會忘記，西方國家以打擊恐怖主義為由，聯軍向伊拉克開戰所帶來的全球反恐與反戰的氣氛。

於是乎，從過往的經典中尋求慰藉或教訓，成了此時文學界在疫疾蔓延時療傷止痛的藥方之一。馬奎斯的《愛在瘟疫蔓延時》，所講述不渝的半世紀戀情，有如對疫病中人性的鼓舞；而卡繆的《瘟疫》

一書所揭示的不畏懼災難並合力抵禦的精神，無論其是否有影射對抗納粹的弦外之音，集體地對抗瘟疫乃能化解人心的猜忌，應該是經典之作帶給人們最大的啓示。

如今疫疾已然暫離，回顧2003年台灣文學的發展，可喜的是未受到「非典」的重要衝擊，大體說來毋寧還是穩定成長的。但是，我們覺得在疫疾初癒的這當時，面對人心的傷痛與肉體的創傷，死亡的陰影彷彿猶在不遠，格外使人興起瞭望新生的期待。巧合的是，我們覺得本年的文學除了延續回顧續有發展的項目外，更值得注目的便是文學新世代的出場。可以說，我們期待經典、閱讀經典，但是我們更需要新生與新星。因為源源不絕的創作

活力，是對抗災難的動力，更是台灣文學繼續盛大、繁衍的基礎。

一、再現經典或重塑經典

進入21世紀後，台灣文學經典的重印，似乎有越來越多的趨勢。究其原因，除了有心的出版者致力於出土過去因特殊原因較少為人注目的作家作品外，再現經典的意義，似乎更是為培養新世紀讀者而出現的出版潮流。我們相信，唯有能夠不斷被討論，從而讓讀者驚嘆或思索的作品，才可能成為經典，也才是經典化的正途。至於有待整編的作家全集，則考驗著出版者的眼光，台灣文學的經典還嫌不夠，我們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全集。

過去一年中，像張恆豪主編《七等生全集》（遠景）10冊，以及朱西甯的《鐵漿》、《八二三注》、《破曉時分》（印刻），《陳千武詩全集》12冊由台中市文化局出版，李瑞騰主編《柏楊全集》（遠流）28冊，彭瑞金主編《李榮春全集》（晨星），都是將作家的代表作重排重印，且往往卷帙繁多，其中也有政府文化單位的補助出版，這顯示台灣的出版界依然不乏有心人在做鋪路的工作。

而施明正《島上愛與死》（麥田）與李永平《追追》（麥田）的再版，便是重新定位「現代主義文學」的一種出版計

畫。對於上一世紀六〇年代以降的許多作家，他們的現代主義文學是否對新世代的讀者有足夠吸引力？應如何重估現代主義在戰後的影響與流變？這當然是出版者與引介者翹首關切的問題。

除了經典重印外，許多在上一世紀作品的整編、選拔也像是在重塑經典一般，格外有繼續觀察的必要。例如孫大川主編《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印刻）7冊，余光中等主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貳）——台灣1989～2003》（九歌）12冊，中研院文哲所與聯合報系合辦「台灣文學與世界文學關係」系列演講，為日後出版《台灣文學選集》暖身；此外，楊青矗還編選了台灣漢詩予以台語注音，推出《台詩三百首》（敦理）。這些甄別、篩選的過程，無疑正在悄悄形塑著台灣文學史未來的面貌；而典律的生成，大抵如此。

至於出版社致力於編選各種類型的選本，也是一種自成體系，凸顯經典的作法，雖有其商業考量（因應越來越多學院中的現代文學課程需要），同時也影響了次文類的發展，正因應讀者需要而逐漸細緻化。如焦桐編選《台灣飲食文選》（二魚）、吳明益《台灣自然寫作選》（二魚），以及廖玉蕙等編《繁花盛景——台灣當代文學新選》（正中）等皆是，可以供不同品味與特質的讀者來選擇。

二、文學典藏與文學推廣

過去幾年，台灣文學系所的成立，曾佔據過我們綜論的不少篇幅。今年，師範大學與靜宜大學又分別成立新的系所，已知來年還要成立相關系所的還有台大、正大、中興、中正、台中師院等校。這充分說明，重視台灣文學研究已成為學院的重要變革，這點我們在年鑑許多次都討論過，此處暫不贅言。

不過，在推廣台灣文學的工作方面，本年值得注意的，倒是另一個方面的工作，就是關於典藏、展示、導覽文學家與文學作品的文藝保存工程。我們認為，無論為文化計或為商業計，官方與民間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開拓空間。

像是「吳濁流藝文館」於3月1日在苗栗縣西湖鄉落成，由地方文史工作者藍博洲策劃，收藏有吳濁流的著作、檔案與照片。新竹縣尖石鄉的那羅溪畔則開闢了「那羅花徑文學步道」，另外亦積極興建「那羅桂竹文學館」，計畫收藏關於尖石鄉泰雅族原住民的文學、藝術作品。

其中規模最大的，當屬10月17日於台南開館的「國家台灣文學館」，收集台灣文學相關資料、圖書、作家文物。《台灣文學館通訊》裡，林瑞明館長說，要將「國家台灣文學館」定位為「文學博物館」，「具有典藏、研究、展示、數位化

與推廣等功能，為我國推動台灣文學研究的據點，也是與世界各國交流的重要基地」。我們對台灣第一個國家級的文學博物館，期許甚深，也希望在行政法人化後，文學館的經費也能順利解凍，以便文學館更積極主動的介入台灣文學的發展與推廣工作，真正成為台灣文學作者與作品的「家」。

此外，國藝會為鼓勵國內優秀創作者，提出「長篇小說創作專案」補助計畫。補助對象為個人創作者，創作期程以兩年為限，成果需為15萬字以上之長篇小說，作品完成後國藝會再結合出版社出版。本年度有王新民、郭少鳴、曾心儀、甘耀明等4人通過，每人補助50萬元。官方在這方面的挹注，相信會得到文藝界的肯定，我們也期待在獎助下能夠「重賞之下必有佳作」。

我們覺得，文學的典藏與推廣，同創作一樣重要。畢竟，後世的讀者，正要透過這些機制才有機會與前行代作家的作品會面。而獎勵與推廣，則是刺激文藝之花生長的美麗陽光與新鮮雨露，求之不得。因此，民間與官方的許多努力，我們應該加以肯定，也更應致力於更多典藏與推廣機構的建立，好讓更多的讀者更方便而親切地接觸到文學之美，讓更多的新星有機會綻放光芒。

三、新世代文學的意義

至於本年度最值得注目的現象，應該是新世代作家的「湧出」，許多經由各種文學獎考驗過的文學青年們，本年度都推出他們的第一本作品，一時之間蔚為一股後浪襲來，其勢頗有可觀。本文認為，新星的出現，使台灣文學的天空更加璀璨，應該是這一年來很大的收穫。

略舉其中數位初出茅廬，如今已漸有文名的新秀便有：甘耀明《神秘列車》(寶瓶)、李崇建《上邪》(寶瓶)、張耀升《縫》(木馬)、伊格言《甕中人》(印刻)、吳易叡《島嶼寄生》(春暉)，陳安琪《月經》、周丹穎《前夏之象》、阿法《寂寞的鞋》(麥田)，再加上先前已發表過較多作品的如：吳明益《虎爺》(九歌)，袁哲生《羅漢池》、《猴子》(寶瓶)等。

當然，我們還注意到作品完成或出版於本年前後，可視為同一批新世代的作者尚有：童偉格去年年底出版《王考》(印刻)；高翊峰本年完成、於2004年初出版的《肉身蛾》(寶瓶)、許榮哲《丁口V口弓丶》(寶瓶)等。

此外，也有著眼於小說新世代的出現而編選的讀本，更顯示這種代有才人出的事實。江寶釵、陳國偉編《小說今視界：台灣新世代小說讀本》(駱駝)，收錄

曹麗娟、鴻鴻、張瀛太、駱以軍、陳淑瑤、賴香吟、洪凌、紀大偉、張蕙菁等17位。可惜的是，黃國峻於六月自縊，算是這一批新秀中過早殞落的新星，令人惋惜。

這些按照台灣流行說法多半被通稱為六年級的作家，以及其他五年級作家，他們湧現在新世紀的文學地平線上，究竟會帶來何種新的文學風景？是我們深予期待的。在此我們無法細論作者個別的風格，也無法驟然為他們尚在發展中的身影定調，僅能藉由一些既有的討論，初步地將新世代文學的可能問題略作勾勒。

我們不難發現，他們通常都經由各類的文學獎而累積起他們進出文壇的聲望，不過，根據這幾年觀察各種文學評審的意見，似乎多指向這樣一種看法，認為當今六、七年級（或更年輕）的創作者，是一種「我、我、我的世代」，或者是「看著自己肚臍眼的世代」，他們以獨語或拼貼的方式，注視著自己的身體或私我的經驗，而較少關切人我關係，並且炫麗的手法或駁雜的流行文化名詞，終究不能為作品帶來更多的深度。

所以陳映真在本年度評審「聯合報文學獎」後，就特別感嘆說：「自數年前因評審而有緣深讀年輕一代文學作品後，直覺感到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後文學消亡之必然。」他所歸結的文學青年的創作特

色是：「對於生活、人、物質和社會描寫稀薄了、膚淺了；沒有統一可信的情節，沒有了對人物的塑造和描寫，沒有對小說環境背景實體的描繪。在題材上，充滿了當時蔚為流行的情慾、同性戀、雌雄一體、「後設」書寫和赤裸裸的商品、品牌崇拜。每次評閱……讀得精疲力竭，對不斷出現的生澀、模仿的主題，反胃欲嘔。」（見陳文，〈文學寫作何去何從？——兩種世界性文學〉，《聯合報》副刊，2003.9.15）

陳映真所提的問題，無非是以上一代所堅持的寫實主義美學與社會關懷立場為出發點，其說或有世代差異所顯現的某種「代溝」，但也不妨引為論證新世代作家的一種切入點。其實關注「我」的問題，這未必是台灣文學界的專利。以今年日本芥川獎的兩位得主綿矢利沙與金原瞳為例，她們都是20歲上下的大學生，所寫的內容亦是關於人際疏離與舌頭鑽洞的女孩探尋自我等題材，顯示的都是當代日本文化的社會與心理狀態。

而就在文學研究領域所聽聞的情形，亦不乏有人說，台灣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家多半被研究過了，許多重要的議題也都在近二十年中一一被掘出，但是下一階段，是否有優秀的新作家可以研究呢？藉由瞭解新世代作家的文學作品，可以更迅速地掌握現代台灣社會與人的脈動；只不

過，過去的作家關心反殖、啓蒙、反共、懷鄉、鄉土、政治等宏大敘述的歷史問題，20世紀末葉的台灣作家生活在一個相對全球化、多元化、自由化的世界，新世代的創作者是否能寫出觸動多數讀者心靈的文字，而不是停留在「個人共和國」的領土上獨舞，恐怕才是問題的焦點。

換言之，寫什麼與怎麼寫，都有一時代的特徵與變化，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對於技巧與思想的堅持，如若不是已經全然失去它們對於新世代創作者的興趣，至少也不是唯一。這一點，我深覺新世代作家還是必須跟著自我感覺走，用創新的心態去開創個人風格。但是，文學與其他藝術共通之處或許是同樣的，創作者必須與閱聽大眾溝通，說使命也許太沈重，不過，想要伸出手去與世界握手的念頭恐怕不能沒有。否則，如果有一天讀者費盡心思都勘不破作品中的玄機，也無從去為之解說、闡釋，屆時或許「作者已死」的說法就要改成「讀者已死」。

不過，由本年許多作者以家族史（鍾文音《在河左岸》（大田）、駱以軍《遠方》（印刻），張大春《聆聽父親》（時報）），或仍不乏台灣歷史為背景的書寫（如施叔青《行過洛津》（時報），從晚清嘉慶、道光、咸豐三代，寫泉州七子戲曲師來鹿港，藉此側寫洛津的興衰。楊麗玲《戲金戲土》（二魚）則寫日治以來羅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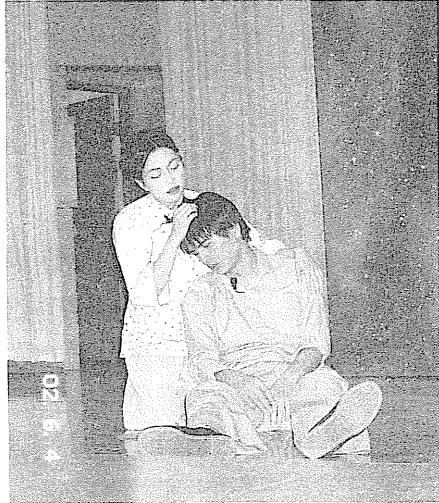


圖 27 在「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中，大開劇團改編《閻雞》演出。（靜宜大學中文系 提供）

帶，一個戲劇世家的家族史，這個家族掌有劇團，也擁有蘭陽一地的數家戲院，後來電影取代歌仔戲在劇院中上演……）。可見台灣作家關懷的面向依然是相當多元的，當中亦不乏五年級的作者。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創作者的文學教養問題，這當然也關係到作家將寫出何種作品。近年每次看到學生交來的創作稿件，都感到學生閱讀文學作品範圍的貧乏，過去的東西方經典之作幾乎已經少人提起，更不用說模仿、學習。他們更多仿效的對象是網路語言或者是電視語言，至多就是當紅暢銷作家的作品。缺少了對於傳統經典的閱讀，使得思考與關懷的偏於世俗取向或流行取向，而無法有較歷史宏觀的視野。

我們再看看台灣作家，幾乎也很少有人在談他們的閱讀經驗，對於傳統，似

乎也少關注。因而值得台灣創作者思索的問題是，如何讓自己的創作具有延續傳統的延續性與現代的創新性，似乎也是創作者能否精進與開新的另一關鍵。

記得在1930年代中期，台灣文藝聯盟的張深切稱許年輕的朱點人為「台灣創作界的麒麟兒」，這個稱號就此一直被貼在朱點人文學的評分表上。很盼望台灣文學有更多優秀的麒麟兒出現，不要讓前輩專美於前，而是在一個自覺有傳統的文學道路上，接力前行。

四、文學會議與文學議題

除了創作與典藏外，文學活動中另一個重要的部分是研究，本年度我們特別注意文學會議所討論的議題，或許也能從中得到寫作與閱讀的新方向。

事實上，本年度的文學會議，的確不乏有別於過往研究的視野，提出許多出更廣闊、深入的研究議題。

例如關於「世界華文」，或是「兩岸文學」的概念，隨著近年來在「全球化」概念鵠起，各國文化微妙交流與抗衡的時候，頗有與英文或日文等語系文學區隔，以求凸顯東方華語文學特色的思考，值得注意。具有此種華文文化圈視野的學術會議，有如「世界華文文學新世界研討會」（中央中文系）、「第一屆國際青年學者漢

學會議：現代文學的歷史迷魅國際研討會」（暨南中文系），「第八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兩岸女性文學發展學術研討會」（佛光人社院）等。至於其後續效應，是要形成何種文學機制或文化場域？台灣文學要如何主動迎接或拒斥這種趨勢？應是來年可以思考的議題。

此外，女性觀點的閱讀，或是女性文學的研究，依然是許多會議深究的問題，像「20世紀台灣男性書寫的再閱讀：完全女性觀點學術研討會」（政大中文系），「兩岸女性文學發展學術研討會」（佛光人社院）皆是。

至於為作家單獨召開研討會，當然顯示作家地位的重要性，這些會議本身自然一定程度地介入了重新定位作家地位的工程當中。配合作品再版或全集出版，這類的會議可預見地將會越來越多。本年度重要的單一作家作品研討會便有：「紀念朱西甯先生文學研討會」（《聯合文學》雜誌社），「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靜宜中文系、台文系），「詹冰詩作學術研討會」（真理台文系）「柏楊文學史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中文系），「鍾肇政國際學術會議」（清大台文所）。

其他亦有以現代散文為會議主題，以及專注探討文學傳媒與文學發展問題的會議，都是台灣文學研究較新的發展。過

去現代散文鮮少成為會議重點，而文學雜誌的研究也常被忽略，如「時代與世代：台灣現代散文學術研討會」（東吳中文系），「文化傳媒與文化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正中文系），都顯示了主辦者想要拓展新領域的用心。

五、結語：文學使人不再憂鬱

在一個日益虛擬化、個人化的世界裡，我們還要因為疫病的隔離而使人心更疏遠；同時我們還會看到以反對恐怖活動為藉口，西方國家出兵伊拉克所造成的更多的傷亡與仇恨。當然，我們更不會忘記，台灣政治變化所造成的立場兩極化，一時之間彷彿人們都只剩選擇兩種顏色的自由（或不自由）。於是，霎時我們不免感到憂鬱，因為許多原先普世的價值受到懷疑，無法對他者的脈動感同身受，人心轉為淡漠，更覺孤立無援了。

在這樣的時代裡，我們或許無法一次就與人重新牽起手來和解，但是，在文學的閱讀中，我們安靜地溝通，就像小說家的作品所喻示的，「縫」，再一次的喚醒我們對於他者的細微感受，讓良知與良能醒來，這或許才是縫合一切傷口，讓人不再憂鬱的方法吧！

在似乎人心惶惶的2003年裡，我們因此對文學有更多的期待。